

# 五十年後重遊歐洲雜感

(續完)

孟昭瓚

## (十) 重溫留英學生時代的舊夢

在倫敦逗留的第三天，原想參觀大英博物館，因為下雨，改往母校倫敦大學本部，以觀五十年後的面貌。這座校本部，是我上次離開倫敦時才落成，開始使用。進入大門之後，毫無拘束的到各部門去看，真是像出嫁的女兒，回到娘家一樣。這時候正是英國人吃下午茶的時間，我選到茶室裏坐了很久，並且和一個新加坡來的華僑學生聊了一陣。我告訴他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績，中國人都以為榮，他也有同感。我們談話時，他總是以中國人自稱，而不提及新加坡籍，我感到頗為欣慰！我到皇家出版局買書的時候，也曾順便到經濟學院去看，問到幾個職員和學生往日教授的名字，他們都不知道。問到最有名的教授為拉斯基 (Laski)，和陶爾頓 (Dalton 戰後工黨內閣的財政大臣) 時，他們都說早死了，使我恍若隔世！五十年不是短的時間，當年的學生現在都老了，遑論其他？人家說往事不堪回首，我的回憶却油然而生了。

### (1) 由讀英文的興趣，嚮往赴英國留學

民國十年到十一年底，我在開封省立第二中學(舊制四年畢業)讀書，英文老師是當時最出名的金幹庭先生。他當時指導學生閱讀英文莎士樂府本事 (Tales From Shakespeare 當時的譯名)、魯賓遜飄流記、約翰遜行述 (Life of Samuel Johnson)、金銀島 (Treasure Island) 等。開始時手裏拿着漢英字典，時刻不離，非常吃力。老實說，這時候有很多同學因為文字深奧難懂，不感興趣，就放棄了。我當時剛讀過英文名言錄中拿破崙說過：「難之一字，只有愚人的字典中有之！」因而我決定鏗而不舍的死讀下去，逐漸的由少懂而多懂，也因而發生興趣。這些書的作者，我記得都是英國人，所敘述的背景人物地名，很多都在英國，因而我對於英國也發生很多幻想。當時想着，假若有一天能到外國留學，我一定到英國去。

民國十二年春，我考入郵政局工作，十三年秋脫離郵局，往南京東南大學附中推廣部就讀，英文老師是鮑德微先生(現在臺北居住)也是名師。十四年秋因成績優異，被保送附中正式班高中三年級，當時的英文教員為李儒勉，和董履吉

先生，都是教員中的佼佼者。附中高三同班同學現在臺灣者，尚有立法委員于錫來兄和外交部的顧大使毓瑞兄。十五年秋被保送入東南大學後，即決定進英國文學系。當時的東大英文系，真是盛極一時！國內名學者有梁實秋、張韻海、韓湘玫、余上沅、張士一、李瑪琍、賽珍珠 (Pearl S. P. B.) 諸先生。我能進入國內一流的東南大學，和現在的大學聯考分發到臺大差不多，心情上感覺到已經躍入龍門，眼界大開。所有英文系教授的課程，無論選與不選，我都隨堂去聽。我所選的課程，有梁實秋先生的英國文學史、韓湘玫的詩的欣賞 (Appreciation of Poetry)、張士一的語音學、賽珍珠的英文修辭與作文。梁先生現在臺灣身體很健康，老年生活也很美滿，我這五十年前的老學生，應當向他祝福。不過，當時他是翩翩少年，光棍一個，身着長衫，不穿西裝。韓湘玫教授年僅廿餘歲，有些學生的年齡還比她大，她不僅英語講的流利，而且非常美麗，所以學生們都說上她的課，不是詩的欣賞，而是美的欣賞。這時候學生們在課堂上，交頭接耳的傳說：梁韓兩位老師正在戀愛，你沒有看到麼？梁先

生把韓教授寫的莎士比亞傳，摘錄起來，並且用打字印刷好，分發給我們，在他爲我們朗誦之後，讚美之聲，不絕於口。(梁先生若看到這段話，把它當作老學生和老老師開玩笑罷了，千萬不要介意！) 賽珍珠是兼任教授，我們都知道她是位出色的老師，但是沒有想到後來是世界聞名的作家，和諾貝爾獎金的得主。在前七十九位得獎人中，只有六位女性，她是其中之一。當時我們只知道她的先生，是金陵大學的教授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，把東南大學先改爲國立第四中山大學，後又仿法國大學區制，改爲江蘇大學，最後才確定爲國立中央大學。我也由英文系轉入經濟系，畢業後先在南京安徽中學任教，後又赴開封民國日報任編輯，並兼任開封第一師範英文教員。按當時政府規定，無論公私費留學，均須大學畢業後，再服務兩年以上，始得出國。這時候我在社會上服務已超過兩年，不過，當時省方官費留學，尚未恢復，而庚款留學僅限理工方面，所以不得其門而入。河南省主席這時候是劉峙，秘書長是東南大學畢業的學長張廷休兄，民國日報的總編輯李鴻晉兄也是同學。張兄任省府秘書長多年，頗有倦意，而有出國深造之念，李兄亦有同感，我說明我的意願是到英國，並竭力勸他們同往，他們也欣然同意，因而結合成三人行。當時的財政廳長是李文浩，經主席指示爲我們撥一筆留學費用。河南的兩位元老，劉雪亞先生任安徽省主席，張伯英先生任甘肅總指揮，聞訊之下，均指示駐京辦事處撥款相助，兩位元老獎勵後進的精神，深爲感佩，沒世難忘。我們三人是在民

國廿二年七月，由滬起程。

(2) 由上海到倫敦，航程長達四十天

這時候正是所謂卅年代經濟大恐慌，本世紀以來最大的不景氣時期。所乘美國 P&O 公司的拉瓦品第號 (Rawalpindi) 郵輪，載重一萬七千噸，經濟艙票價原爲八十餘鎊，打折後僅五十餘鎊。下午約四時半起碇，和朋友們揮手告別後站在甲板上，緩緩的通過吳淞砲臺，駛出黃浦江口，最初所看見的是長江滾下來的黃水，不到一小時後，黃水不見了，所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藍色大海。從這天起，到倫敦那天止，我們按日曆計算，整整是四十天，誰能想到現在乘飛機僅需廿小時？對於今後世界的變化誰還敢預測？這艘郵輪沿途停泊的地方，絕大部分都是英國的殖民地。其先後次序爲香港、新加坡、檳榔嶼、可倫坡、孟買、亞丁、蘇伊士運河口的塞德港、地中海的馬爾他、法國西南部的普里茅斯，以及終點站泰晤士河口的帝里伯雷碼頭 (Tilbury Dock)。中間停留最久的是香港和新加坡，都是三天。航程時間雖久，但因沿途可以遊覽各地風光，頗覺新奇，倍增情趣，因而也不覺其苦。所可惜的是，船上每天都有豐富而美味的大餐及各種樣式的點心，當時尚不能欣賞。

在香港除了遊覽風景之外，曾拜見過黨國元老胡漢民先生。胡先生當時曾任國民黨中常委兼宣傳部長，暫時在香港休養。張李兩兄都曾在宣傳部工作，是胡先生的老部下，我和胡先生並無一面之識。他們都力主我同往，我也以能與黨國元

老一見爲榮，所以三人同往。由黨內同志安排，派車來迎，駛往半山胡先生的寓所，相見之下，頗爲親熱。胡先生神采奕奕，甚健談，對我們除了說些勉勵話之外，因爲張兄曾任秘書長，就跟着說當秘書長應當革命的秘書長，對於有關問題的處理，應當向上司分析其利害，假若他的意見比你的更好，你應當照辦。假若他並沒有好的意見，而不表示同意，你感覺他的神情不對，馬上從口袋裏掏出另外一個方案來，以迎合他的心理，這種作風是姨太太式的作風，是真正的官僚！說話時還提出某名人爲例，這裏不便說出。至今思之，猶覺胡先生的音容宛在。在新加坡所看見的都是中國人，街上都是中國字的招牌，還有電車，公共汽車上都有中國字，好像是仍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心裏覺得非常舒服。而最使我們感到痛快的是，胡氏兄弟(文虎，文豹)所興建規模相當大的海水浴場，門前木牌上所寫的字是：「只有中國人才許進入！」恰好和上海英租界黃浦灘公園遙遙相對。黃浦灘公園門首，英國人以前掛個木牌，上面寫着：「中國人與狗不許進入！」當時反英的輿論大譁！我們離開上海時，我記得這個木牌已改爲：「除非衣着整齊 *neatly dressed* 遊人一概不許進入。」英人卑視中國人的情形，可見一斑，胡氏兄弟，可算是替中國人出口氣！

船上旅客除自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，上來的中國人共有十幾位，和在孟買上船的若干印度學生之外，其他都是英國人。記得以前曾和英國人的「中國通」談到中西文化的異同的時候，他曾

說過：「好奇怪而且很有趣的是，你們中國人和英國人在習慣上，和文化上，有很多地方完全相反。譬如說，我們寫字是由左而右，你們是由上而下；我們宴客的時候，離主人最近的位置是上座，而你們則是離主人最遠的位子（意指對面）爲上座；我們上菜的時候是先上湯，你們是最後才喝湯；我們是自我爲大，所以寫字的時候，凡是我字總是大寫，而你們都是說做姓張或王；問到你們的臺甫時，你們總是說小字某某等……」

在這裏我還可以加一點，就是在中國，先生們白天上班的時候，必須衣着整齊，下班回家的時候，就感覺到身心都解放了，所以領帶取掉，換上便服甚至光着膀子。而在英國不然，一個家庭主婦白天在丈夫上班的時候，穿着却像歐巴桑一樣，很勤奮辛勞的整理家庭。等到晚上，一般考究的家庭主婦，都在沐浴之後，換上晚禮服，有的甚至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以待丈夫的歸來，而丈夫回來之後，也必然換上晚禮服，陪着夫人聊天散步，或參加各種社交活動。沿途中每天晚飯後，甲板上都是無數成對成雙的英國男女，穿着漂亮的晚禮服，遊來遊去，走到我們沒有穿晚禮服人的面前，好像是胸膛挺得特別高，顯示着神氣十足。當時我就有一種厭惡的感覺，並認識了帝國主義者的真正面貌。在香港上船的有一位看起來很有教養，而秀美的年輕英國女人，帶着一個五六歲的混血男孩。她並不和這般英國人打招呼，專和我們中國人和幾位英國傳教士在一起。後來才知道她是當時我國外交家朱兆華的兒媳婦，小孩子就是他的孫子。她有一次問我：「你知道那些穿

晚禮服，走來走去的是什麼人？」我說：「當然是你們英國的紳士和淑女。」她說：「你錯了！他們這些人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在英國每月十鎊的工作都找不到，來到中國之後，每個月可賺到五十鎊，不要睬他們！」

郵船經過紅海，駛到蘇伊士運河口的時候，各船隻須排隊等候所有從對面駛過來的船通過後，再行進入河內。運河中間有一個湖泊，是準備中途船隻排隊等候的地方，因為運河本身很狹窄，僅可容納一隻船通過，而不能並行。當時船艙內還沒有冷氣設備，下午很多人都上甲板上乘涼。這時候正是夕陽高照，映射在岸上的沙漠成橘紅色，蔚藍的天空，偶爾點綴幾朵白雲，加之岸上的駱駝隊，和騎在背上的阿拉伯人，唱着旅人之歌，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，同時清風徐來，令人精神爲之一爽！旅客們正在欣賞岸上風光之際，旁邊有一個英國人，看起來不像其他英人那樣的粗俗，忽然和我打招呼，問我：「日本人？中國人？」當我告訴他我是中國人的時候，他的神情似乎是改變了，接着問：「中國現在的情形怎麼樣？會不會因軍閥內戰而分裂？列強共管有可能？」我馬上告訴他：「中國現在已經統一了。過去中國的內戰，主要的仍是在中國統一。中國是一個民族，一個文化，一種語文和傳統，永遠不會分裂！共管是帝國主義者在作夢，這個時代是侵略者，和民族主義抬頭抵抗，作殊死戰的時代。試問日本軍閥侵略我們東北的土地，比德法兩國加起來的面積還大，而國際聯盟，僅僅派一個李頓調查團，毫無實力援助的表現，其他

還談什麼？」他感覺到話不投機，所以也沒有再談下去。「日本人？中國人？」是以前歐洲各國——尤其是英國人對於東方人的一般問法，他們一定把日本人說在前面，深恐說錯了會使日本人感到不快。萬萬沒有想到，現在的中國是戰勝國，列爲四強之一，在歐洲一般人看到我們時，還是問：「沙油那拉？」

### (3) 對於倫大經濟學院的初步印象

我是中大經濟系畢業，到英國之後，當然還是繼續研究經濟。不過，在沒有去英國之前，我所了解的，只是英國有三個著名的大學，牛津、劍橋與倫敦。而牛津與劍橋是貴族大學，中國學生的官費，僅敷其費用的半數，所以進這兩個貴族學校的都是富家子弟的自費生。倫敦大學的歷史較晚，聽說成立之初，就在改變這種階級觀念，使國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，所以收費低廉。因而絕大多數的中國留學生，都集中在倫敦大學。在國內時聽經濟系的教授說：現在研究的經濟，在外國最著名的大學有三個，一個是倫大的經濟學院（後改爲經濟政治學院），一個是劍橋大學，一個是美國的哈佛大學，這三個學府是鼎足而立的。同時又聽說倫敦大學共有廿多個學院，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商、醫等，無所不有。當時想着這個世界著名的大學，一定是比中央大學大十幾倍，有古老雄偉的建築，大的運動場、圖書館、宿舍等。沒想到同學們帶我到經濟學院辦理申請手續時，看到該院就好像是上海的先施永安大百貨公司。其他學院都分散在各處，並不集中。當時使我頗感躊躇而失望，想着像這樣的百

貨公司，如何能成爲世界上最有名的學府？這個心中之謎，直到一年之後才解開來。

這時候英國大學的教學政策，是採自由式的，注意學生聰明智慧的發揮，和天才的發掘，寧願一百個學生中僅培植出幾個優秀的人才，而不願這一百個學生都是不好不壞，很平庸的人。他們認爲理論重於實際，理論領導實際，理論變了，實際上的應用也就會因之改變，理論難，實際易，而理論是靠智慧高的人來發明的。聽說他們大學部的課程，最重要的有兩門，一個是邏輯 (Logic)，一個是語文 (本國文和外文)，邏輯是思考的方法，語文是研究的工具，有了工具和方法，以後就靠自己努力的探索，和名師的指導了。經濟學院大部份是研究生，聽說這個大百貨公司的學生有四五千人，學生的國籍有四十幾個。我在討論班 (Seminar) 上，曾遇到兩位美國學生，他們都曾拿到美國的博士學位。我問他們：「你們已經拿到高等學位，爲什麼還到這裏作學生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想了解更多一點的理論」。由這裏也可以看出英國人崇法務實的精神。記得胡適先生以前說過，在民國初年的時候，有些窮鄉僻壤的國民小學，設在破舊的廟宇裏，設備簡陋，但是非買一個風琴不可。梁實秋先生也說過，爲什麼大學裏一定要有一個大操場？經濟學院的圖書設備，可以說是應有盡有，假若你需要更珍貴的資料，指導教授會告訴你到大英博物館去找。該校主要的特點，就是羅致了很多國內外的名學者。除了上面提過的拉新基的政治學，陶爾頓的財政學之外，經濟理論方面，有奧國的

海耶克 (Hayek)，德國的鮑恩 (Bonn)，英國的羅賓斯 (Robins)，和金融方面的哥雷 (Garobry) 等，不勝枚舉。另外倫敦和劍橋好像是有聯合講授的默契，換言之，倫敦的教授可以到劍橋講授，劍橋的教授也可以到倫敦來。譬如說我在經濟學院曾聽過劍橋名師皮古 (Pigou) 的演講，上過羅伯遜 (Robertson) 的課，也參加過凱因斯 (J. M. Keynes) 所主持的討論班。凱

氏是這半個世紀以來，風靡世界的大經濟學家，他的名著「就業的一般理論」是一九三六年問世，主持這個研討班是一九三五年，尚在宣讀論文，讓大家討論批評的階段。當時我對他（現在算起來，當時他應爲五十三歲。）的印象是頭略禿，留有短鬚，一望而知是一位高度智慧，風度綽約，和具有深度修養的學者。我記得當時他提出的重要論點爲，儲蓄等於投資的闡釋，對於經典派市場理論和利息理論的批評。經典派認爲支出是被動的，決定於生產及貨幣數量，凱氏則認爲支出決定生產與所得，所以是主動的。換言之，解決失業問題，應革除舊觀念，而採取主動的支出。當時參加的學生約有廿餘人，另外還有幾個助教，多半是經典派的信徒，因而所提出的問題，都是主動支出以解決失業，所引起的後果——通貨膨脹。至今自由世界所面臨的困擾，仍是充分就業與通貨膨脹，兩者之間如何使之擺平的問題。

#### (4) 研究生？博士？碩士？

中國學生在倫大政經學院 (英文名叫經政或簡稱爲經濟學院) 讀書的很多，而多數都是研究

生。所謂研究生者，就是向學校申請指導教授，聽他的課，有問題時可以隨時向他請教，並按規定繳納學費。其優點是：第一、對於有興趣的課程或問題，可以廣爲涉獵，不像讀學位時，專在某一論文題目上鑽牛角，限制了讀書的領域。第二、當時國內的風氣是注重實際的學問，而不重虛名或頭銜。如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周鯨生、王世杰、張奚若、錢端升等，都是英國的留學生，而沒有學位。聽說王世杰雪艇先生的博士學位是在法國取得的。第三、英國也不注重學位，而重實際，例如當時的凱因斯並沒有學位，學生們和同僚都稱他爲 Mr. Keynes 後來因爲他的功勳卓著，皇家封他爲伯爵 (Lord Keynes)。

蔡子民先生當年辦北京大學的政策，很有些像英國倫大的精神，他也是重實際不重虛名，教學方面採自由式，注重長才的發揮。畢業的好學生，在學術上和政治社會地位方面，都是傑出之士，而很多的畢業生，在中等學校教書，都不受歡迎。當時在倫大政經學院的研究生，現在臺灣者，如司法院黃少谷院長，稍晚的外交部朱撫松部長，已退休的考選部李壽雍部長，以及現駐梵諦岡周書楷大使，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研究生之名，有時候也包括了讀學位與不讀學位的總稱，因爲所收的學生，起碼都是各國的大學畢業生，而取得學士的資格，前來繼續研讀者。按英國當時的學制，最高的博士學位，在理科方面，他們叫 D.Sc.，文方面爲 D.A. 法方面爲 LL.D. 獲得這種學位是最高榮譽，但是極爲不易。這時候我們知道，以往所有中國學生中，得

到這種學位的只有三個人：一個是戰後首任駐英大使的鄭天錫先生，為英國的法學博士，即 LL.D，一個是中國地質學界的泰斗李四光先生，另一個是東南大學畢業的吳定良先生都是 D. Sc.。據吳兄說他和現在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是同時。要想讀這種博士學位，必須先讀過他的碩士學位，也是很嚴格。假若對於某一科門，沒有深厚的基礎和高度的智慧，是沒人敢嘗試的。

中國學生所申請讀博士學位的，都是 Ph.D. 是拿美國的一般標準而定的。據一位英國同學告訴我，這個學位是新增加的，因為英國的博士學位太難，又不肯降級授與，而很多外國學生，若拿不到一個博士學位，好像是對於他們的國家沒有交代。外國學生大多數都是從殖民地來的，所以有人說它是殖民地學位 (Colonial degree)。這些話當然仍含有大英帝國視殖民地的心理，不值得和他辯駁。申請讀 Ph.D. 學位的，須經學校面試，指定導師，再由導師和學生商定論文題目，指定參考書籍和資料，並須經常和導師接觸，研討論文內容。論文完成後，不須筆試，但須再經口試通過。當時讀博士學位 (Ph.D.)，而現在臺灣就我所知道的，有考試院副院長張宗良兄，東海大學法學院院長伍啓元兄，和外交部的陳岱礎大使。當時讀學位的人，都是盡量避免人知，更談不到炫耀。假若我看到張宗良兄，稱他為張博士，他必然是怒形於色，以為我諷刺他。想起當時讀書人的氣質，含蓄，學養，和務實的精神與現在相比，真是令人感慨萬千！有一次我在臺中某大學上課的時候，忽然聽到校內馬

路上鞭炮震耳，還有花花綠綠的鼓樂隊在前引導，我以為當天必是校慶，原來到處貼的紅紙上所寫的是：「歡迎某校友榮獲美國博士學位回國！」，看起來簡直和滿清科舉時代中了狀元，錦衣還鄉的情形沒有兩樣！不過一個是中國狀元，一個是洋狀元。

當時我選擇的是按英國學制的規定，而比較辛苦的道路，就是讀經濟碩士學位 (M. Sc. Econ.)。在我未選定之前，先來英就讀的同學曾告訴我，讀這學位是很吃力的，除了論文之外，還須參加集體筆試，邀請外校教授參與當面口試，吃力不討好，最好申請讀 Ph.D. 當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來到英國讀書，就應當按它的學制逐步學習，不應當怕難。由於必須筆試，可以鍛鍊自己當場的寫作能力，認真口試，平時也可藉以加強英語應對的能力，只要實際學力充實，學位名義吃苦與否，可以不必計較了。後來筆試是採聯考方式，即倫大各學院讀同一學位的，須同時集中參加，時間是兩小時，題目好幾個均須解答，我覺得我寫的分量，和繳卷速度，並不比英國學生差。口試除了導師之外，另聘請了一位伯明翰大學的某經濟教授同來參加與主試，他們也沒有難住我。論文方面，因為時間比較長，一再修改比較辛苦。學校為我指定的導師 (Supervisor) 是懷爾先生 (Mr. White)，是一位副教授 (英國稱 Reader)，很負責認真，也是一位標準的英國學者。對於論文中常常指出某種不合適 (irrelevant) 應如何修改，甚至某一句多餘的話，也要刪除，引用他人的意見，應當很

忠實的把他的著作名稱某版某頁指出等，其誨人不倦，及認真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國內一般學者們，常常說為什麼留英學生都很穩重誠懇，不多發表文章，大概是受這種訓練的影響吧？現在臺灣早年讀經濟碩士學位，就我所知道的，有前交通銀行董事長陳勉修兄，已退休的再保公司董事長卓東來兄，和讀行政碩士，現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秘書長郭驥 (外川) 兄。

#### (5) 維多利亞聯盟與中國學生會

在國民政府尚未統一中國之前，因為戰亂的關係，國內學生到國外留學的不多，往英國讀書的更少。在倫敦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，多半是來自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緬甸、泰國等處。這些地區，雖然泰國情形稍有不同，但在英國人的心目中都是殖民地。所以仍以大英帝國極盛時代的維多利亞為號召，稱中國學生會為維多利亞聯盟 (Victoria League)。開會時須唱英國國歌 (God save the King)，法定語文為英文。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之後，政治安定，各項建設突飛猛晉，國民生活也逐漸改善。在這一段安定時期，赴英留學的中國學生，打破了以往的紀錄，也就是英人稱為來自中國本土 (China Proper) 的留學生最多的時代。中國學生都是大學畢業，而且在社會上會服務兩年以上，民族國家觀念極強，參加了這種學生會，都感覺到不啻是以殖民地自居，不成體統。所以大家互相約定，用多數參加的方式，把它改組，並決定唱國歌，以中文為法定語文，自由交談時，中英文皆可，名稱定為中國學生會。

中國學生會設在倫敦高華街(Gower Street)的中國學舍(China House)。當時同學們認為另外還有一個 Victoria House，裏面包括了印度等殖民地的學生會，大家決定把它改為中國學會(China Institute)。因為這個地方同時也是中英文化交流，和社會活動的中心，所以我駐英公使館特派館員張似旅先生主其事，而實際上的幕後操縱者，是英人西爾考可(Silcock)。西某是一個在中國很久的傳教士，對於中國的壞的一面，無所不曉，對於中國學生之富有國家民族意識，不像殖民地學生那樣的恭順，更是厭惡。聽說這個地方是英方人士捐贈的，其宗旨在溝通中英文化，促進兩國友誼，和協助中國學生所遭遇之困難等，這些工作西某都沒有做到。我只記得他做過一件事，就是在某一晚會上，節目當然都是他安排的，參加的除中國學生外，還有英國對於中國有友誼關係或興趣的男女人士。節目進行到中途，西氏忽然引導一位頭戴前清的圓頂帽，身穿清朝官員的褐色大褂，後面垂着一個長髮辮，手裏拿着一把長旱烟桿，口裏含着烟嘴，搖搖擺擺的進入會場中。當時中國學生大嘩，都說這明明是西某故意出中國人的醜態！大家蜂擁而上，把他的帽子打下來。主事的人怕打傷了他，趕快把他拖到另一房內躲避，結果大家都很不愉快，西某我想更感到沒趣。我會到另一房間看過這位留髮辮的中國人，問他為什麼作這種出中國人醜態的表演？據他說：他姓馬，河北保定人，沒有讀過什麼書，自幼喜歡在馬戲班裏混，後來一位英國人把他帶到英國來，他的髮辮就是

他演技的大本錢，和倫敦的雜技團，簽一次約酬金就有幾百鎊。並且說他也幫助過很多的中國留學生，還很感慨的說，既然大家認為是丟中國人的臉，我就不再幹這一行好了！

留英學生的生活是很枯燥的，每天大家都是提着一個小書箱，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寫作。中午在校內用簡單的午餐，下午飲茶，晚上到中國飯館吃頓晚餐後回家休息。最無聊的是週末，因為學校關門，無處可去。同學等有鑑於此，乃有行健社的成立，其目的在組織同學，於週末時作郊遊野餐，海濱游水，比賽網球，或參觀等節目，對於調劑同學的生活情趣很有幫助。現在的立法委員白瑜、胡鈍齋、陶鎔、汪新民諸兄，都是當時的領導人物。當時中國同學的生活圈，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平時都喜歡和自己的人來往，不願打進英國人的社會裏。記得在同學集會的時候，中國公使郭泰祺先生，時常提醒同學們，不要光讀死書，週末或假期的時候，應多利用機會和英國社會接觸，以增進兩國間的了解和友誼。實際上，在學校裏有很多的活動組織，為各種球類組織(倫敦也有球場在郊外)擊劍會、拳劍會、拳擊會，還有形形色色的俱樂部。我所參加的是大同俱樂部(Cosmopolitan Club)，各國的學生都有參加，並且經常有很好的活動節目，如野外露營，接受家庭宴會，討論問題等。有一次這個俱樂部在校內舉行討論會，參加者約五十餘人，主持人邀我講述蛻變中的中國(Changing China)。我講了大約一小時，解答問題一小時，共約兩小時。散會之後有一位校外來參加的小姐

，向我自己介紹，並給我一張名片，記得好像是國際文化交流組織的工作員。她還說希望以後和我保持連繫。大約一星期之後，她打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到某一學校裏講中國問題？我當時答應，並約定會晤時間地點。到時候她帶我去的是倫敦有名的一個貴族學校，伯德福女子學院(Bedford College)。這裏參加討論會的，大概是一班的學生，都是十七八歲天真無邪的女孩子，好像是從來沒有見過東方人，其驚奇、興奮和歡喜的情形由其表情可知。講完之後，所問的都是很天真的問題，例如中國平常吃的是什麼東西？衣服是什麼樣子？筷子是怎麼使用？聽說在中國男女結婚之前，互不相識，是真的麼？

從此以後，我不知道參加了多少這樣的青年討論會。這時候美國的治安是世界聞名的，更沒有聽說過有不良少年的問題。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們對於青年的輔導很注意，全國風景區都有青年旅社(Youth Hotel)的設備，價廉物美，和臺灣救國團所辦的青年活動中心差不多，不過他們的數目更多，更普遍。另外各社區都有以教會為中心，所安排的各種青年活動節目，國際問題討論會，也是其中之一，我所參加的多半是這種集會。另外我還參加過十幾次規模較大，約有數百人的主講，事後他們還贈送我伍鎊到十鎊不等的酬金，最初我都給他們退回，但是他們又寄回來，說這是英國的規矩，非接受不可，我也就不勉強了。最使我感到痛快的是有一次某學會請日本大使館的秘書，我記得他的名字叫 Niki 的，主講中日問題，邀我作反面的辯論。這位日

本人是把事先預備好的講稿宣讀一遍，因為發音不好，聽衆似懂非懂。大意是說日本之佔領東北，是因爲中國政府沒有能力維持治安等。讀完後，我當即起立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陰謀，田中奏章，和武力侵略的事實，以及如何違反國際公法等，駁得他啞口無言！我說他啞口無言，是指他當時緊張的說不出話來，勉強說些話，大家也不懂，而且還有很多聽衆幫助我說話，都指責日本是一個侵略者，結果使這位日本秘書悻然而去！

### (6) 賽珍珠、鄭天賜、與熊士一

爲什麼把這三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？因爲這三個人都是有關中國文化，傳統道德觀念，以及中國農村實況的「最」者。賽珍珠所寫「大地」(Good earth)一書，所改編的影片，與熊士一所寫的王寶釧(Lady Precious Stream)劇本，據當時的報載，都打破了以往的紀錄。換言之，「大地」影片和「王寶釧」戲劇，在戲院裏放映和演出的次數，超出了過去任何影片和劇本，都是票房紀錄的最高者。鄭天錫先生所領導展出的中國古物展覽會，參觀的人數更是大大的超過了任何外國的古物展覽，在倫敦出盡了風頭！

賽珍珠的「大地」影片，我曾看過兩次，劇情倒是很簡單，形容在中國農村裏，土地就是農民的生命。在北方某年發生大旱災的時候，農民都向南方逃亡。有一個鄉村的農民捨不得離開他們的土地，以爲村中某一戶富家中，必有很多的存糧，到最後村民都把所有的糧食吃光的時候，都羣起一窩蜂似的向這戶富家進攻，破門而入之

後，到處搜索，才發現這個富戶的糧食也吃光了，所吃的原來是觀音土。這個影片之所以能吸引英國這麼多的觀衆，其原因不外乎：第一、英國一般受過教育的人，對於中國這個古文明國度裏的一切事物，都有一些奧妙和神秘感，總想多了解一點。第二、賽珍珠所寫的「大地」這本書，當時風靡世界。第三、影片中有三個是一般人想看而看不到的鏡頭。一個是北方天旱時所發生的蝗災，片中演到這個鏡頭的時候，觀衆只見突然烏雲密布，不見天日，霎時間聽到嗡嗡之聲盈耳，過去之後只看見一片大地的農作物，葉莖都吃得淨光，觀衆們都驚歎爲宇宙奇觀！甚至有些人不敢相信有這種怪事！另一個鏡頭是，火車鳴鳴的聲音，夾雜着噹噹的鈴聲，慢慢的開來一列長龍似的難民貨車，不僅車裏面的人像沙丁魚一樣，車頂上擁擠的人更像是人山，還有火車頭上面也有坐的站的難民，看起來好像是火車一轉彎都要摔下來的樣子。戰前的歐洲人，誰看見過這種鏡頭？還有一個是農民慶祝時所唱李鴻章的花鼓歌的鏡頭。李鴻章當年在歐人心目中，是一個傳奇人物，我在倫敦一個大書店裏，曾看到半個書架子裏所放的都是有關李鴻章的書籍。聽一位駐法使館的朋友說，當年李鴻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到法國外交部拜會時，因爲大門太窄，李鴻章所乘的八人抬的轎子無法通過，法國外交部馬上就把大門拆掉改寬。李鴻章的花鼓歌之所以出名，是因爲他在英國須參加各國使節的社交場合，偶而飯後有餘興的節目，請各人唱歌或表演。當時大家鼓掌請李鴻章唱歌，他說不會，

大家再三的鼓掌敦促他，最後大家齊說，唱一個國歌好了。李鴻章一聽說國歌，想着不能不唱，但清朝又沒有國歌，最後只有唱一個家鄉的鳳陽花鼓，大家聽着怪怪的，因而鼓掌大笑，後來還有音樂家按他的怪聲怪調，把它譜出來，傳遍民間，李鴻章的花鼓歌，因之名聲大噪！大家聽說「大地」影片中有花鼓歌，當然都想聽聽到底是什麼樣？

鄭天錫先生負責辦理在美國舉行的中國古物展覽會，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很多留學生都是義務的當場幫忙，如接待翻譯等。所不幸的，是這位大法律學家，把會場中的中國地圖上的東三省，畫成一個滿洲國。留學生們發現之後，馬上把它摘下來，並向郭泰祺公使報告，聽說郭公使生氣的拍起桌子來！鄭天錫聽說留學生們要打他，嚇得在這個期間不敢露面。書生誤國，大抵如此。這時候還有一位清華大學的陳達教授，某一團體聽說他是人口專家，請他演講。我和余紀忠兄(中國時報的董事長)曾前往聽講，這位先生的英文是中國式英文，宣讀準備好的論文時，好像是往日私塾的學生背書一樣。這還不講，最丟臉的是他講日本侵略東北是人口問題，因爲日本人口的密度高，所以導致佔領東北。當時的聽衆都是中國的同情者，一致譴責日本爲侵略者。還有人質問他，中國內地的人口密度更高，豈不也應侵略日本？余紀忠兄當時氣得跳起來，請主席制止他發言，說他不是中國人，是日本間諜！留學生們聽到這種消息之後，輿論沸騰，郭公使更爲憤怒，這位先生看情形不對，也就悄悄的回國了

當時所展覽的中國古物，現在大概都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裏珍藏，安然無恙。因為當時我在展覽會看到的很多東西，故宮博物院裏，都依然存在，也可能我們當時並沒有把全部的古物運去展覽。不過，當時所看到的很多好東西，在外雙溪看不到。因為，在展覽會中，英國的收藏家，都很樂意把他們所收藏的中國古物，借出來共同展覽，以飽英國大眾的眼福。我記得最令人注目的是瑪麗皇后（現在伊麗沙白女王的祖母）借出來的玉塔。這個玉塔，在我的記憶中，約有四五歲小孩子那麼高，羊脂白色，無絲毫雜質，玲瓏雅潔，令人讚賞不已，不忍離去。另外還有很多極為精緻的瓷器，玉器，和雕刻等，我想大概都是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，在皇宮中搶奪，或自民間廉價購得的。這個展覽會因為極受英國人士的歡迎和讚賞，所以展期屆滿之後，受各方的請求，又延長一段時間。英國人對於各類藝術活動和藝術品極為重視，奇怪的是一般大賈富商，興趣更為濃厚。這時候差不多每隔一天，我總是陪着由英國朋友輾轉介紹給我的大亨去參觀。有一次我所陪的大亨，沒隔好久就請我到他家裏吃飯，他還請我多約幾位中國學生同來。他家裏佈置的豪華，和餐廳的氣派簡直像一個國宴。另外作陪的還有幾位劍橋大學的學生，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太古公司的大老板。他告訴我英國很多的文化事業，都是靠工商界捐助的，如學校、文化研究，以及音樂藝術社團等，他本人捐助的都不計其數！現在國內的大企業家已經不少，想起某財團支

持的某一藝術團，因不賺錢而被取消，能無愧色？

熊士一所編的「王寶釧」劇本，最初在小小戲院 (Little Theater) 上演時，與其他戲院相較，並無特異之處。這裏須加以說明的，就是小小戲院，並不是很小的戲院，不過是它的名稱而已。他的劇本出版，並經報紙介紹之後，有很多劇社都爭相排演。有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，他家住在布來頓 (Brighton) 一個本地劇社排演由他擔任薛平貴非常成功，他說很喜歡這個劇本。經過若干時間之後，這個劇本，就傳播起來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好劇本，而且經報紙報導，小小戲院的演員，都是當時的明星，所以戲院的生意，還算不錯。不過，有一天報紙上大字登載着，瑪麗皇后會到小小戲院看中國戲劇「王寶釧」，並且大為讚賞。從此以後王寶釧與熊士一之名大噪，購買戲票須在一個月預訂。因此這個戲院也大發其財，演出的次數，打破了任何戲院的紀錄。在這頓峯期間，熊士一兄曾贈送我們幾位好友，數張最榮譽的前排中間票。當時在座的我記得有張宗良、葉守乾（師大教授，曾任研究所長）、韋從序（政大教授，曾任商學院長）、胡秉正（政大教授，曾任教務長），及蔣彝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）諸兄。所有的觀眾都是着晚禮服，見到我們幾個沒有穿晚禮服的中國人，坐在前排，都是刮目而視！

熊士一兄得到這份榮譽，聽說也是來之不易，先把紅燦烈馬這一段翻成英文，請了很多美國研究戲劇的高手，加以改正，使之如何適合英國

人的胃口。然後再拜訪當時的英國文家如蕭伯納等，請其指教，並拜託他向出版界介紹，中間會吃了不少的苦頭。這個劇本是好幾幕的話劇，當然不能像中國舞臺上的鑼鼓喧天。演員的演技可以說個個都是高水準的。尤其王寶釧穿着中國的古裝，不僅完全像中國古代的美女，而且所表現出的高貴氣質，很適合英國貴族的風格。對話時字字清朗，聲音圓韻，其真實性比唱的還好。老夫人的慈祥，和憐惜痛愛小女兒的神情，也是逼真的。我想老瑪麗皇后，看到這一幕時，會有很多人的感觸，她勸他的長子不要因為一個女人，而放棄王位時的真摯情感，又何嘗不是這樣？薛平貴自西涼國回來時，所乘的馬，不是我們舞臺上所用的一根不長不短的桿子，纏着許多顏色的粗線絲，而是真的馬鞭子，在臺上繞一周行走時的姿勢也是和騎在真的馬上一樣，配合着真的馬蹄聲音，我們看起來，也很別緻有趣。劇終散場的時候，我在觀眾羣中，所聽到女士們所說的，都是：「十八年？我的天啊！」（完）

##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 16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 160元

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